

书评

← (上接 11 版)

认识西洋,并重新发现日本。

少年时代的加藤周一体弱多病,对于世人称作儿童游戏的东 西,没有丝毫兴趣,而是“不求回报地、不带目的地、单纯地享受知识的乐趣”。加藤与早熟的同学无法成为知己,而听话的好学生一丝不苟的举止在加藤眼中显得滑稽透顶。读初中那年,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学校里“忠君爱国之类的东西倒是没少教,‘基本人权’之类的问题却从来不提”。回顾初中的时光,加藤直言没有一个老师在兴趣上、人格上,或者在世界观上对自己产生任何影响。

加藤的父亲是为人方正、淡泊名利的医生,家中二楼书房的书架上大多是德语的大部头医学书,文艺类书籍只有少量关于和歌的书,而且半数以上是《万叶集》的旧注释本。然而,作为“无奈之选的《万叶集》却为我打开了一扇想象世界的大门”。《万叶集》使加藤感受到一些具有音乐特性的东西,体验到诗歌类文艺作品的玄妙之处。而《万叶集》毕竟是古远的文学,无法解决现实生活对少年时代的加藤造成的困惑、沉闷、煎熬,直到遇见芥川龙之介的文学。芥川在20世纪20年代便犀利地揭示了日本近代国家的本质。其晚年作品《侏儒的话》中讽刺军人犹如小儿,对加藤启发良多。“不管是学校、家里,还是社会,一直以来所信奉的被神圣化的一切价值,竟不堪芥川龙之介的这一击,它们在我眼前瞬间坍塌。”1936年,加藤周一高中入学考试前夕,爆发了陆军将校兵变的二二六事件,加藤在现实中看清政治权力近乎荒谬的残酷,决心从此远离政治。次年,于战后担任东京大学校长的矢内原忠雄教授在演讲中洞察了日本即将踏上军国主义的不归之路,作为一名听众,加藤被其自由精神深深感染。2004年,加藤周一与大江健三郎、小森阳一等作家、学者成立了维护和平宪法的“九条会”,反对“放弃战争条款”的修宪。这表明加藤的立场并非远离政治,而是拒绝独裁的坏政治,不与之同流合污。同时,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不惮于投身政治,维护和平的希望。

在东京驹场就读高中的三年里,加藤周一遇见了许多优秀的老师,如在夏目漱石名作《三四郎》中被称作“伟大的黑暗”的人物原型——哲学教授岩元禎,研究日本佛典的德国人斐措尔教授、用柏格森



大江健三郎



永井荷风



夏目漱石



丸山真男

《形而上学导论》德译本授课的片山敏彦教授……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加藤就读高中,还是考入东京大学医学部,选修文学部的课程,在学习了三个月基础语法之后,教师便直接以外文原著作为教材授课。这一方式与现今通行的,偏重语言基础训练的外语教学不同,是通过文史哲外文原著的读解、翻译,综合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人文知识、思辨能力。这并非掌握语言的捷径,对于有志于学的学习者而言,却打通了语言与人文、思想的壁垒,是需要艰难攀爬却风光无限的历练。此外,当时尚未有“通识教育”的理念,但是从加藤周一的教育经历来看,大学提供了宽松的氛围、高质量的知识、思想传授体系,而他感兴趣的正是“包括了感觉和知识的世界整体,以及整体的结构”,因而能够打破学科的限制,成长为学识丰厚,极富洞见的学者。

加藤周一自述,大学期间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法文科副教授渡边一夫,他“生活在丑态百出的日本社会中,却从更广阔的世界和历史的角度来定位自身的存在”,渡边研究的16世纪是宗教战争的时代,而“这不仅是一个遥远国度的过去,它也是日本和日本所在的整个世界所面临的现在。”日后,渡边的学生中有一位也深受其影响,以文学反思人的

存在本质,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学生便是大江健三郎。

加藤在战争期间读完大学,留在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当助手,没有上战场。而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离去,不乏在战场上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其中就有加藤的友人中西。读高中时,中西便对时局抱有清醒的认识。加藤认为中西之所以战死,是因为“权力终于不能再骗到他,于是就用了物理上的力量,强行将他送往死地”。加藤在战争中活了下来,相对和平的生活环境给他提供了冷静反思的空间,并对未来抱以希望。《羊之歌》的前篇最后一章以《八月十五日》为题,文章的最后一句是“所以,希望还是有的。我们缺少的,就是粮食。不过,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

认识西洋,发现日本

永井荷风是加藤周一偏爱的作家之一,相近的留洋经历或许是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在随笔《物与人及社会》中,加藤详细追述了永井荷风的经历与思想,认为1907年旅居法国里昂的一年对于荷风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具体而言在于“感觉教育”,即感受性的成熟。而对于加藤而言,旅欧的经历不仅使其感受性更加丰富,思想上也完成了一次重大的飞跃。

加藤自述经历了两次明显的转变,“一九四五年秋,我朝着战后的日本社会出发。一九五一年秋,我启程去看西洋。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出发”。在此之前,他与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彦合著的《一九四六——文学的考察》出版,为日本战后文学批评带来新的气象。1951年秋加藤周一开始了三年多的旅欧经历,他深入理解之前在书本上接触到,而今亲身体验的欧洲文化思想。同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日本人的身份认同,在与欧洲文化的比较中重新审视日本的文化及传统。

加藤周一旅居法国时,主要在巴黎大学的医学部从事研究工作,然而医院和研究室之外的世界无疑更吸引他。在《羊之歌》的续篇中,加藤主要记述了旅欧四年中所见之人、所读之书、游历之处。除了欧美人,他还结识了旅居欧洲的日本人,并对雕塑家高田博厚的观点——“所谓文化,就是‘形’,所谓‘形’,就是外化的精神;精神只有通过自身的外化,也只有通过这唯一的方法,才能实现自我”——产生了共鸣。当他游历各地,看见罗马的风景时,脑海中浮现出《古今集》之后的和歌中的景致;听到西洋音乐,不自觉地想起日本的义太夫,认为西洋的义太夫,就是法国人说的香颂;中世纪音乐则让

他联想到从镰仓时代一直传承至今的横笛的旋律——加藤的这种体验并非思乡情切,而是有意识地在相似与差异中思考曾经熟悉却又变得陌生的日本文化,正如在出国之前他在《何谓日本文学》中提出的问 题一样,何谓日本文化,成为一个清晰且有待解决的课题。

渡过英吉利海峡,踏上英国的土地之后,加藤惊讶地发现“以前我不曾察觉到的和英国有关联的种种习惯,实际上都是从这个国度进口而来”。与法国青年交流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文学修养横向扩展,国际化却又肤浅;而对方的修养以本国历史为轴,纵向发展而且深厚。可以说,文化的差异诱发了加藤的思考。“多年以后,我写了《杂交种文化》,在文中强调了日本现状的表象之下潜在的各种可能性。那个时候,我就想起了自己在大学城里的这段经历。”加藤周一的评论集原题为《杂种文化》,出版于归国后翌年。中译本1991年出版,标题为《日本文化的杂种性》。此次《羊之歌》中译本为避免中文“杂种”一词的语用学贬义色彩,将其译为较为中性的“杂交种”。

与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近代日本的文明史位置》《艺术的精神史考察》等专业性较强的著作相比,“杂交种文化”这一概念简明易懂,为一般读者所熟知。对于十年前出版的这本文化论,《羊之书》中并没有专门列章节详述。思考“杂交种文化”的契机及其内涵,散见于《外部所见的日本》《格物致知》等几个章节。经过六个星期的海上生活,轮船接近了九州的海岸。“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从外部看日本。”沿途经过诸多的城市,让加藤思考“存在于亚洲之中的日本”,并于归国后撰写了一系列评论文章,探讨日本文化的特质。加藤强调了旅欧期间的经历对于思想转变的重

(下转 13 版) →



《翻译と日本の近代》



《夕阳妄语》



《雜種文化》